

目 錄

繁體版序 當深圳成為第五隻「小龍」 /3

原序 遇見深圳 /7

緣起 /18

第一部分 | 奇蹟 21

引言：什麼是深圳奇蹟？ /22

解鎖深圳 /26

深圳奇蹟的一些深層次構成要素 /31

第二部分 | 調查 37

對話劉曉都：深圳的城市發展與建築實驗 /38

對話陳 寧：深圳的 AI 創新和全球影響力 /62

對話劉曉春：深圳經濟特區 —— 中國改革開放
與法治創新的國際樣板 /88

對話李清泉：深圳大學的教育創新與人才培養 /110

對話劉 珩：深圳的城市精神與文化創新 /126

對話于 盈：深圳創新創業的全球優勢 /148

第三部分 | 解答 171

深圳的深層根源 /173

深圳作為「有界但滲透」的樣本 /185

深圳：和而不同 /199

深圳與神奇三角 /210

結論：對深圳的一些思考 /216

參考書目 /227

附錄 /230

緣起

本書的緣起，要追溯到 2024 年我與吳筠女士在劍橋的那次會面。我曾在劍橋接待過為數不少的中國朋友，但這次會面有些特別。首先，她是我見過的為數不多的女性官員之一。其次，就連我自己都沒有想到，短短不到一年，我和吳女士討論的內容已經呈現在你們面前。這本書的寫作時間很短，但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幫助，似乎也體現了一種「深圳速度」。

正如我在這本書的訪談中發現的，許多「證人」也從側面證實了一點：深圳的官員似乎與其他地方的官員有些不同。他們更積極，更務實，更注重將討論的內容付諸實踐，而不是讓它停留在討論的層面。比如吳女士，在我們短暫的劍橋會面後，她立即組建了一個籌備小組，成員包括了深圳報業集團的孫錦女士、深圳市教育局的劉金英女士和深圳出版集團的魏甫華先生。可以說，這個籌備小組是這本書的「孵化器」，沒有合適的孵化器，這本書難以與讀者們見面。我也希望這本書的順利出版可以推動更多有關深圳口述史的研究。

雖然本書寫作時間很短，但我必須感謝陪伴我 50 年的伴侶薩拉。正是她對我們歷次深圳之行的詳細記錄，讓我對深圳的記憶如昨日般鮮活，這也在本書開始策劃時給了我更多信心。薩拉的部分日記

將在第一章作介紹，從那裏讀者們也可以一窺在五十年婚姻生活中我們是如何作為彼此生活中的伴侶和工作上的夥伴而存在的。

同時，本書之所以能夠呈現在各位面前，除了緣起於我和吳女士的見面，還要感謝促成這次會面的我曾經的學生馬嘯。她也促成了我第一次對深圳的訪問。我不僅從每一次的中國之行中了解中國，也從我結識的中國人身上了解中國，其中又以與我的學生們的交流最多。雖然我有很多中國學生，但馬嘯在畢業後仍然幫助我持續建立與中國的聯繫。我的另一位學生王子嵐女士則在劍橋與我一起從事與中國相關的工作，致力於搭建兩種文明理解互鑒的橋樑。

當然，作為一個外國人想要寫一本研究中國的書是很不容易的。在這個過程中，本書得到了許多力量的幫助。首先我要感謝本書的合作方深圳大學——我是深圳大學的名譽教授，深圳大學黨委書記李清泉院士也是本書的訪談對象之一。吳報水、巢乃鵬先生對本書的立項提供了大力支持，王朝潔女士、曾憲聚先生和韓水仙女士在後續的項目執行中提供了事無巨細的幫助。其次我想感謝參與本書訪談的各位人士，感謝他們在繁忙的日程中安排出了共同的訪談時間，並且對我的問題作出了精彩的回應。當然，我還要感謝深圳出版集團的諸位同事，他們為本書的進一步完善付出了卓越的努力，尤其是韓海彬、李奇蔚、呂詩琪和楊可等幾位與本書合作密切的編輯。感謝特約編輯歐陽婧禕女士和特約記者謝晨星女士為本書作出的貢獻。感謝劍橋康河出版社編輯團隊的李玥、周鈺以及實習生郭子尤對此書作出的貢獻。感謝何文、卓嘉琪、陳素絢對本書的插圖和圖表作出的貢獻。特別感謝深圳大學的葉亢教授對本書中的歷史節點進行校對。

最後我要感謝的是本書的另外兩位年輕合作者——荀曉雅和秦雨晨，她們都是劍橋的畢業生，其中一位在畢業後回到了深圳大學工

作，進一步展示了深圳這座城市對於優秀人才的吸引力。深圳的這一特點，讀者們也可以從各位證人的「證言」中尋找到更多的證據。我和這兩位年輕的學者認識超過十年了，這很不容易。從我 83 歲的經驗來看，人的一生可能會認識很多人，但很少有人能和你在十年的時間裏保持聯繫，並且關係密切。

這一次和她們的合作並不是我們第一次合作，多年前她們就翻譯過我的書，這一次我們可以共同寫作一本書，一起為書的內容出謀劃策，就像福爾摩斯和華生一樣，一起在眾多的線索中解答謎題。雖然福爾摩斯是解開謎題的那一位，但解謎的過程離不開值得信賴的助手華生。在福爾摩斯的故事裏，華生是那位敘述故事的局外人，但在這本書裏，我的兩位合作者提供了局內人的想法和參考，讓我這個局外人可以更好地觀察、理解並解答深圳之謎。

引言：什麼是深圳奇蹟？

歷史發展的進程在下圖中得以直觀體現（見圖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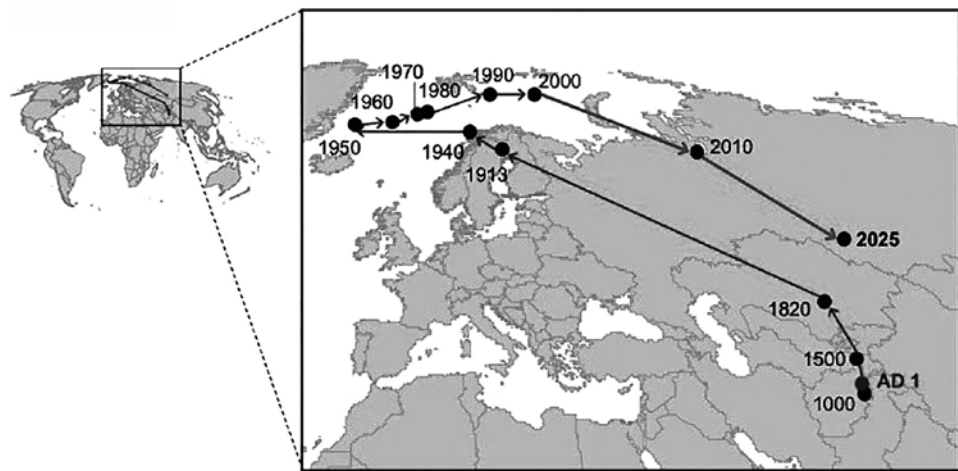


圖 1.1 此為從公元一年至 2025 年地球經濟重心的遷移路徑，2000—2010 年間世界經濟重心發生了迄今為止最快速的轉移，逆轉了此前幾十年的發展趨勢。⁸

圖片來源：麥肯錫全球研究所基於安格斯·麥迪森和格羅寧根大學數據進行的分析

8 經濟重心是通過在三維空間中按 GDP 加權位置計算得出，並投影到地球表面上最近的點。重心的表面投影在本世紀過程中向北移動，這反映了在三維空間中，經濟重心越來越位於北半球上方，朝向亞洲方向。「西方」和「東方」的經濟重心是通過將世界分為兩個經濟半球計算得出的，但它們並不能「相加」得出全球重心。

*

假如你是一名字航員，或是一位來自火星的訪客，於 1980 年從高空俯瞰我們的地球，你所見的夜景將呈現如下景象：世界上某些城市光芒閃爍，這意味着這些區域正在大量消耗電力。其中，西歐和美國是最為明亮的區域——毫無疑問，這些地方的大都市消耗着巨量能源用於照明和供暖。若將視線轉向亞洲，你會在少數幾處區域看到類似的現象，例如日本以及「亞洲四小龍」——韓國、中國台灣、新加坡、中國香港。然而在印度，幾乎看不到顯著的光亮，中國大陸則近乎完全籠罩在黑暗之中，呈現為一片漆黑的區域。

但若如今再次觀察，你會看到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遠東的廣大地區已經煥發光芒，尤其是中國，這裏已成為全球最明亮的地區之一。在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城市燈火通明，甚至中國中西部的部分地區也同樣光芒四射。這一切變化始於 1980 年，只用了短短 45 年。

這既是一個奇蹟，也是一個謎團。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工業、技術、科學和經濟革命就發生在這段時間。如果你看到了這些，然後進一步調查並觀看延時攝影畫面，你會看到在中國海岸線大約四分之三的位置，緊挨着一個高度照明的區域——香港，出現了一個微小的光點。如果深入調查，你會發現那就是深圳。

1980 年時，那裏還只是一個微小的光點，到了千禧年底，深圳的光芒已經異常強盛，雖然還不及香港，但已然成為一座能源消耗巨大的現代化大都市。謎團在於：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為何在那裏發生？為何在那時發生？又是如何做到的？

在此之前，中國可以說是在黑暗中掙扎，原因在於其歷史。中國曾經在軍事與經濟領域都稱得上是世界的霸主，然而其地位在 19 世

紀初期開始受到挑戰。自 19 世紀 20 年代起，中國經歷了一系列經濟危機，隨後又在 1840 年捲入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當時英國已向中國傾銷鴉片，西方各國的軍事力量日益增強，在中國展開一系列殖民掠奪。自那時起，整整 100 年間，中國經受了接連不斷的打擊：兩次鴉片戰爭、大規模內亂、清朝覆滅、軍閥混戰、日本侵華……中國不斷遭到摧殘、分裂，在國際舞台上逐漸邊緣化。

在飽受磨難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49 年成立，新的政權致力於統一全國、實現社會公平。統一的目標基本得以實現，但為了實現平等，中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那時的中國近乎與世隔絕，技術落後、高等教育停滯、人民生活在極度的困苦之中。在當時幾乎無人相信，在可預見的未來，這樣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國家能擺脫困境。

在深圳展開的社會實驗，猶如一堆潮濕的木柴，起初難以點燃。然而有人在其角落點燃了一小塊乾柴，放置一些樹枝，木柴因此逐漸開始烘乾。火焰緩慢蔓延，乾枝越來越多，最終發展成一場熊熊大火。

因此，深圳被公認為是中國過去 45 年來經濟、社會、文化巨變的火種和起點，它也因此而不可或缺。倘若沒有深圳，我們難以想像當今的中國會是什麼樣子。而在當時，人們幾乎無法預測在深圳發生的奇蹟。在起步階段，改革似乎沒有成功的跡象。因此，它被視為一個不可預測也難以解釋的歷史奇蹟。這類似於其他歷史奇蹟，例如英國的工業革命——即便是生活在革命初期的偉大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也未能預見其發展軌跡。所以這些改變世界的獨特事件是非常引人入勝的。

深圳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研究此類奇蹟形成過程的寶貴機會。對歷史學家或社會學家而言，它具有諸多研究優勢：例如地理範圍相對有

限，僅是中國的一個局部區域——相較於研究整個中國，理解深圳要簡單得多——這就像一個「試管實驗」。你可以去把握深圳這個具體案例，而不必面對整個中國那樣龐大複雜的研究對象。這和研究威尼斯、倫敦或紐約的崛起過程有異曲同工之處。而深圳的獨特之處在於，這場奇蹟仍在進行中。參與其中的企業家、經濟學家、建築師等關鍵人物大多仍然健在，可以接受訪談。

因此，本書試圖以偵探破案的方式研究深圳這一「謎題」。首先要確定究竟發生了什麼，即需要解釋的實際事件。隨後，如偵探走進「案發現場」，詢問相關人員、尋找線索，重建導致這一結果的可能原因組合。最後，偵探綜合分析並解釋最終導致這一獨特奇蹟或案件的因果鏈條和聯繫。

為了更好地進行這種「偵探式」調查，我們選擇了口述歷史的方式。這一選擇基於我們多年來在劍橋的研究實踐——自 1982 年我的導師傑克·古迪（Jack Goody）爵士發起「大師訪談錄」項目以來，我與劍橋康河出版社的同事已完成對 300 餘位頂尖思想家的訪談。

口述歷史的價值在於獲得那些往往未被正式文獻記錄的真實故事。通過與不同背景的深圳人對話——從政府官員到企業家，從學者到建築師——我們希望理解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國際因素如何在這座城市中相互作用。

本書的核心內容基於六篇深度訪談，這些對話者從不同角度見證了深圳的發展歷程。他們的「證言」將幫助我們拼貼出這個現代奇蹟的完整圖景，就像偵探通過多個證人的陳述來重構案件的真相一樣。

解鎖深圳

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出現也算是歷史上的一大謎題：它何以發生？為何會在 18 世紀的英國發生？這些問題值得討論。探究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成因是我整個學術生涯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我也研究日本在 19 世紀後期進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原因。如今，我正在努力分析歷史上第三次重大變革，即在 20 世紀末至 21 世紀初於中國出現的工業技術革命。上述產業革命都是巨大的飛躍：第一次發生在西歐，第二次發生在日本，第三次發生在中國。

思考上述問題時，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作品讓我深受啟發。韋伯在許多著作中探討了產業革命的話題，他對德國南北方發展的差距尤其感到困惑。韋伯提出了四五個重要因素來解釋這一差異，其中一個廣為人知的因素是「新教倫理」，即積累、勤勞、誠實、節約等品質，他認為這些品質源自加爾文主義，以及新教徒對能否得到救贖產生的焦慮和不確定感，他們因此希望通過行動來證明自己。德國北部存在這種信仰基礎，而南部則沒有。這一因素同樣適用於英國的情況，R.H. 托尼（R.H. Tawney）等人豐富了和發展了這一論斷。

意識形態無疑非常重要，在韋伯對其他國家的比較研究中體現了這一因素的作用，之後的許多學者也在這一領域進行了深入拓展。

例如，羅伯特·貝拉（Robert N. Bellah）在《德川宗教》（*Tokugawa Religion*）一書中提出，日本的意識形態中也存在類似新教倫理的元素。韋伯和貝拉都認為，這種強調積累、節約、勤勞、將利潤用於擴大再生產的新教倫理十分重要。

韋伯也列舉了其他重要影響因素。其中一個是法律體系，它必須保障和支撐經濟發展，保護私有財產，並為經濟運行搭建一個基本框架，其中包括債券和抵押貸款等金融工具，以上內容大多來自德國本土法律而非羅馬法。由此可見，法律因素十分重要。他還討論了某些政治、社會和經濟制度的運行模式。韋伯的理論框架可以讓讀者了解資本主義這頓「大餐」所需的食材清單，對相關領域的研究十分有益。厄內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的《犁、劍與書》（*Plough, Sword and Book*）一書中在此基礎上進行了系統化的發展。但在我看來，要想真正理解資本主義產業革命的結果，我們的眼光不能僅停留在其組成因素上。

當然，你確實需要了解大餐的配料。但你真正需要的是一份食譜——一個精確的算法，告訴你如何平衡各種配料以及投放的時機和方式。你需要知道用多少糖、多少鹽、多少胡椒、多少米等。你還需要知道在哪個階段添加哪種配料，它們如何相互作用，了解其中的化學反應、品質特性、時機把握以及相互關係，這樣才能做出一道菜。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資本主義的成功。

以英國為例，其最明顯的特徵就是島國的區位條件。它是一個資源豐富的島嶼，擁有悠久的製造業發展歷史，還有長期、穩定、獨立的法律和政治體系。英國的地理條件對其發展影響深遠，此外，英國還抓住了多次歷史發展機遇，實現了財富的積累和技術的進步，這些優勢與之後出現的一些有利因素相互作用，例如蒸汽動力的使用和